

『華北新報』に関する研究 (続き) 《华北新报》研究 (续)

程 曼 丽^{*1} 刘 波^{*2}

The Study of “North China New Pos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CHENG Man Li^{*1} and LIU Bo^{*2}

Abstract: “New North China Daily” is the organ that Japan-controlled Chinese puppet government established in the enemy-occupied area as well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Japan-oriented news daily in the North China area at the later stage of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This article takes “New North China Daily” as the subject of case study, studying the newspaper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opaganda ideas of Japan-controlled newspaper based in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From the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tent choice, title setting, editorial style and business of the “New North China Daily”; from th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ew North China Daily” as the example, reviewing the objects, guidelines, strategies and system of Japanese propaganda towards China during WWII.

Key word: Propaganda, Strategies

『華北新報』は中日戦争で日本軍に占領された華北地域において日本軍が経営した機関紙で、中日戦争後期に華北地域で非常に影響を与えた新聞である。本論文は、『華北新報』をケーススタディとして、ミクロ側面並びマクロ側面で日本に占領された時期に日本軍に経営される新聞の経営理念および政策宣伝をめぐって研究した。ミクロ側面で、『華北新報』の内容やコラム配置、論調の特徴、業務レベルなどを整理し、まとめた。マクロ側面で、『華北新報』から第二次世界大戦時期に日本が中国においての宣伝宗旨、目標、戦略および新聞宣伝の体制の特徴を分析した。

キーワード：宣伝、戦略

摘要：《华北新报》是抗日战争后期日伪政府在中国华北沦陷区创办的机关报，也是抗战后期华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日伪报纸。本文即以《华北新报》为个案，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日本侵华时期日伪报纸的办报和宣传理念进行分析研究。微观上，本文对《华北新报》的内容选择、栏目设置、言论特色、业务水平等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宏观上，本文以《华北新报》为镜子，映射出日本二战期间在华宣传的宗旨、目标、策略以及新闻宣传的体制特征。

关键词：宣传，战略

1944年5月1日，原来华北地区的《新民报》、《庸报》、《天津新报》、《民众报》和《实报》等五家最主要的日伪报被合并为一，成为《华北新报》¹⁾。社长管翼贤在《华北新报》创刊一周年纪念文章中写道：“华北新报是华北唯一之统合新闻体制”²⁾，它是为了“树立健全舆论先声”，“应统一华北思想之急务，乃相与协力创刊华北惟一代表报纸之华北新闻”³⁾。《华北新报》作为抗战后期华北地区唯一的日伪报团，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逐步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形成了统一的日伪报纸宣传体系。

*1 北京大学ジャーナリズム・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院，*2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学院大学院生

在华北,实际控制新闻界的是日军北支派遣军报道部和当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华北所有相关的宣传纲要必须由华北政务委员会政务厅情报处制定,华北宣传联盟、华北新闻协会根据纲要制定细则,实施对华北新闻事业的具体指导。日伪政府还成立了各类新闻宣传统制机构,辅以各种新闻法规,从组织制度上保障新闻的统制宣传。一是成立中央报业经理处等机构统一控制报业资源和经营;二是制定《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等统一的宣传方针、宣传宗旨和宣传侧重点;三是通过中央通讯社等机构控制沦陷区报纸的新闻来源;四是成立统一的宣传培训机构汪伪中央宣传讲习所,为汪伪宣传培养专门人才,并轮训伪宣传部及各地伪宣传部门的人员。

《华北新报》的报道曾多次赞扬这种所谓的“统制联协新闻宣传体制”的成果,比如1944年9月26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肩负起时代任务确立新闻体制》的报道,认为集中兵力统一宣传首先能够“节约新闻资材”;在新闻业务方面,能够强化与同盟社、中央通讯社的联系;报道认为由于报纸是强有力的新闻宣传工具,因此“全国新闻的统一,不啻是全国舆论的一致”,报道还称正是这种“战时集中统制的新闻体制”,新闻界才“得以集中全力,从事于自己的战时新闻事业,对国家的使命必能早日完成”,并“给与吾人以整个国家统一的观感”⁴⁾。

这种高度统一也体现在报纸本身。例如,报纸的内容重复雷同现象严重。报团试图通过内容控制的集中和单一性来控制民众的视听,以便通过高强度的宣传力度达到统一舆论的目的。《华北新报》在形式和版式上,各地的分支都保持一致,各地的分支报头都采用同样的字体。《华北新报》各地的每日社论都是一模一样。北京《华北新报》和天津《华北新报》社论的重复性尤其高。同时,响应日伪当局的政策变化和号召,各地报纸在同一时期内容侧重点和的变化轨迹都非常一致。政府负责制定报道宣传的政策和内容,宣传方向则严格跟随日伪政府和日本政府的政策变化和战争局势发展。

一、《华北新报》的版式与经营特征

《华北新报》的社长管翼贤是一位有着丰富办报经验的老报人,早在1928年就在北京创办了闻名一时的《时报》,颇受当时读者欢迎。《华北新报》可以说是继承发扬了其专业化优势,在办报实务方面有不少值得推奖之处。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版式固定,栏目清晰。《华北新报》的版面和栏目设置都相对固定。创办初期,报纸是对开大报,两张共八个版面,宽40厘米,长53.7厘米,分为两版要闻、两版地方新闻、两版副刊和两版社会新闻。直到1945年5月2日,因华北新闻纸、油墨等物资供应紧张,改为一大张共四版,版面安排顺序为:一版要闻;二版地方版(每逢周二地方版改为国际版,介绍国际外交、政治、军事等相关信息);三版副刊;四版社会版。报眉明确标示着各个版面的名称。从5月10日起,版面变成周二三五六日一大张四版,周一四刊为半张两版的小报,小报宽27.5厘米,长约40厘米(日本投降前夕,版面篇幅改动频繁,在此便不赘述)。

《华北新报》的栏目之间通常由细栏线分割,大张报纸分16栏,小张报纸分14栏。文字竖排繁体。标题基本上由引题、主题和副题构成复合式标题,大部分竖排,偶尔有单行横题。有时会使用大字号通栏标题整合内容。为了强调报纸的舆论导向,报纸版面还出现了通栏标语,以抓住读者眼球。

2. 栏目内容与“时”俱进。所谓与时俱进,是指栏目设置和内容紧跟时局和事态的发展。首先,《华北新报》的报道内容侧重点和新闻框架的设计服务于太平洋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甚至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时期报道的焦点明显不同。其次,随着日本战争政策的不断变化,《华北新报》的栏目设置也不断调整。如副刊版的“新国民”栏目就是配合日伪政府当局所推出的

“新国民”运动，在报纸存续后期创办的栏目。《华北新报》“与时俱进”中的“时”并非“时代潮流”，而是“时局的变化”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和日伪当局“利益、立场的变化”。《华北新报》的“与时俱进”是完全服务于它统一沦陷区民众思想的任务的。

3. 图片丰富，版面活跃。新报的大部分栏目都有前后一致的栏目图标，以区别于其他栏目。每日头版至少有一张图片，由于头版报道以战况报道居多，头版图片通常都是日军行军作战的照片或者地图。为弥补当时摄影照片的缺乏，《华北新报》刊发了大量图片：战争报道一般辅以行军作战图和地图；文学副刊版面则配以简单生动的小插图；介绍新发明新科技的文章用素描图案来说明等等；报纸也刊登漫画等。

4. 注重发行，苦心经营。《华北新报》的社长管翼贤曾经说过：“报纸除非买了出去，否则没有人看，若没有人看，则无论发行这个报纸的目的如何高超，都是没有用处的。”⁵⁾为此，《华北新报》非常重视经营和发行。北京《华北新报》除总社可以办理发行外，还设有三个营业所——王府井八面槽69号、西四南大街38号、宣外大街56号三个，分别分布在北京城东、西、南三面；报社还设有内二区新北街13号、东四隆福寺街内36号、外二区和平门外西琉璃厂139号等二十九个贩卖所。各营业所负责订阅、发行等事宜，贩卖所虽不能订阅报纸，但可以负责报纸销售发行事项。北京《华北新报》还为《天津华北新报》代理订阅，“由专差每天送报，三个月订一次”⁶⁾。《华北新报》在抗战后期日本新闻纸、油墨资源极度缺乏的时候，仍然坚持出版，保证报纸的发行。

5. 记者站点发达，报团联系紧密。《华北新报》创刊初期，共有两个分社——北京总社和天津支社，后又成立了石门、太原、保定分社。报社设立分局若干，分局主要负责向总社和支社提供各地的新闻消息。《华北新报》的稿件除副刊外一概不采用投稿。绝大多数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新闻稿件主要来自“中央社”和日本“同盟社”。每天的地方新闻稿件都是由各地方支社投稿。各地方支社向总社投稿后，总社每天派专人定时去车站领取各支社送来的“稿袋”（这是一种用皮革与帆布特制的军用袋，封锁严密，开袋钥匙由日本人亲自掌管）。稿袋取来后由日人编辑局长或次长亲自开拆审阅后，将准备采用的一般稿件及图片分发整理部（版面编辑），翻译部、制版部处理，其中的战报和情报则由日本记者与有关方面联系后再进行处理⁷⁾。

6. 开展社会活动，标榜人文关怀。为了塑造为国为民的形象，《华北新报》作为日伪统治的宣传机关，注重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活动，标榜人文关怀。第四版的社会版设立了《社会服务报告》栏目，每日一期，报道报社所进行的社会服务活动，比如济贫捐款运动、市民免费注射疫苗活动等等。报社还会随时局、时令的变化，调整社会服务活动的内容，例如，冬赈运动和施舍暑药运动就是季节性很强的活动。《华北新报》也通过这一栏目向民众募捐集资给日军购买飞机，还将捐款较多的人的名字详细地列出来予以表彰，号召更多的民众加入捐款，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最终露出了掩盖在“人文关怀”假面下的真面目。

7. 活动多样，联络读者。为引导受众舆论，收买民心，《华北新报》费尽心机，通过各种方式拉拢民心，保持同读者的联系，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形象。它的拉拢方法主要包括：征文活动，活动主要针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内容主要围绕“大东亚战争”、“光的华北”等，以文学活动为名，行伪宣传之实；座谈会是《华北新报》经常利用的一种联系读者的形式。座谈会表面上借口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直接地了解采访民意，保证报纸言论自由、观点自由，给予读者发表意见的空间；实际上，是假借百姓之口，向当局表态，欺骗读者；此外，新报还在第四版社会版上创办了一些与读者直接联系的栏目，比如“民意”、“寄给读者”、“老百姓意见”和“读者来函”等等，定期与读者进行交流。

二、《华北新报》的内容分析

尽管《华北新报》苦心经营，在办报实务上吸收了许多以往的优秀经验，但其进行日伪反动宣传的内容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失败的命运。以下选取《华北新报》某段时间的头版头条、社论、和副刊内容为对象，来观察《华北新报》是如何违背基本的新闻道德准则，不顾真相，颠倒黑白，哄骗民众，而沦为一张拙劣的战时宣传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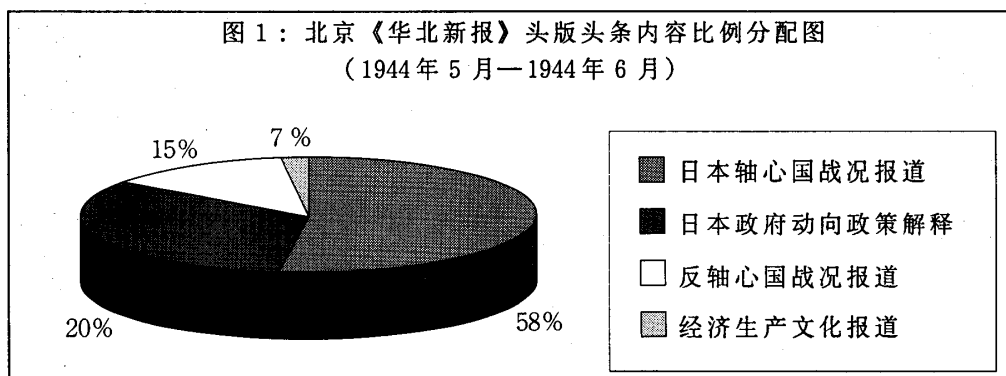
（一）头条分析

报纸的头版头条被置于报纸最醒目的部分，体现的是报纸希望向读者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可以说是报纸的“灵魂”所在。对报纸头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而准确地把握报纸的政治倾向和立场。下面，我们以1944年5月1日至6月30日的北京《华北新报》头版头条报道内容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首先，依据标题中心词，可将头条报道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 （1）以日本及其盟友轴心国为主体的战况报道；
- （2）日伪政府及日本政府动向、政策解释和政要讲话等相关报道；
- （3）以反轴心国集团为主体的战况报道；
- （4）关于华北和日本的经济、生产、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报道。

统计结果为：1944年5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北京《华北新报》的59条头条报道中，关于日本轴心国战况的报道32条；关于日伪和日本政府动向和政策解释性的报道11条；同盟国战况报道8条；经济生产文化等社会报道3条。比例分配如下图：



从数量来看，四类头条中侧重的是日本轴心国的战况，以及日伪和日本政府的动向和政策解释；关于同盟国的情况和社会报道则被置于次要地位。这基本符合《华北新报》的三条创刊宗旨：明确华北新体制；大东亚战争之必胜与完遂；推进华北新建设⁸⁾。其中，11条对政府政策进行解释的报道无疑将“帮助”读者“明确华北新体制”；而宣扬轴心国的胜利则试图体现“大东亚战争之必胜”。相比而言，“推进华北新建设”的头条远远少于其他几类，想必也是由于日本在投降之前军事频频失利，自顾不暇，所谓的进行基础建设不过是为战场提供后勤服务罢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的殖民统治难以维继。

其次，从头条报道的具体内容来看，也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大量的战争报道。日伪报纸对战争的大力报道与日本对战地消息采访的大量投入密切相关。日本国内报社和统一管理新闻界的“内阁情报局”在政府当局的赞助下，先后向中国、东南亚、太平

洋地区派出了将近三千人的庞大战地记者团。记者团组织严密、装备齐全，政府及有关军事部门对这些记者团的采访报道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战地记者团利用便携式无线电发报机，通过各个分社和中继站，将消息迅速发回，以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行动⁹⁾。然后，日伪报纸通过同盟社、汪伪中央通讯社获取这些战况消息。

2、宣扬日本及其盟国战绩卓著。笔者做了一个有趣的统计，北京《华北新报》头条显示，自1944年6月23日到6月30日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集团在欧洲战场先后击沉同盟国集团舰艇71艘、航空母舰7艘，击落同盟国集团战机超过241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激烈的战斗中，轴心国集团的战舰和战机都完好无损，没遭到任何的创击。这与实际情况显然相悖。

3、从地理、文化和东亚亲善的角度为日本侵略中国战争辩护，宣扬中日亲善以及大东亚共荣。报纸竭尽全力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统治和对亚洲的侵略战争辩护，宣扬中日“同源同种”，大东亚共荣是救中国、救亚洲的根本途径。与此相对的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丑化英美形象，强调日本必胜。

4、解释说明日伪政府和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例如，日伪政府建立报道协会、新民会等团体的动态。

5、剿共反蒋报道也挤占了一定的版面，《华北新报》称中国共产党方面为“共匪”、“赤匪”，充满贬损之意；而对待蒋介石方面则用“重庆”或“渝”指代，拒不承认国民党政权在当时的合法政权地位，试图为日伪政权的合理性作无用的辩护。

6、为了替日本紧张的前线战局提供后方支持，日伪当局也督促经济复兴——开展华北地区的社政建设尤其是生产运动，其中核心问题包括煤、棉花、电力、交通等基础物资和设施的建设。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诸如物价上涨、物资囤积和吸毒等，因为与普通民众关系密切，也在报纸上得到了一定体现。所谓提倡基础物资设施的建设，恐怕在当时日本军政府和日伪政权都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只能是空喊口号而已，这一点从此类头条的数量上可以得到印证。

（二）社论分析

如果说头条是报纸的“灵魂”，那么社论则是“编辑的呼声”。对此，《华北新报》社长管翼贤曾经有过论述：“报纸社论版为报纸对各种问题所持态度发表意见之所在”¹⁰⁾。管翼贤认为，社论代表报纸的声音，可以由编辑以批评家、读者的朋友、预言家等各种身份来撰写，能影响舆论，其作用举足轻重：1、制造舆论、表达舆论、影响决策，由事实的评述唤起读者对特别重要事实的注意来引导舆论的方向；2、社论可以使新闻与意见分离，突出社论的地位；3、社论版内容广泛，融娱乐与信息之中，能够详细解释描述事情的前因后果，在报纸的各类报道形式中处于“领袖地位”；4、社论甚至能够鼓动受众行为，怂恿、领导读者；5、社论还可以发表报纸的政策。

《华北新报》的社论栏目位于头版正下方，每期一评（由于石门和保定的《华北新报》创办时间较晚，版面篇幅有限，因此并非每天都刊载社论）。社论针对日伪政府最重要的举措、政策和方针以及战争时局的重大变化发表评论，是代表《华北新报》观点和意见的栏目。社论栏目的字体略大于普通报道的字体一号。一般来说，社论栏目占头版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一；如果有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和时局政策改变，社论的版面还可能增至整个版面的一半。

下面选取1944年5月1日至1944年8月31日北京《华北新报》的头版社论为对象，同样从数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根据言论内容，可将其分成四大类：

（1）战争时局评论。指所有与战争相关的评论，包括对战争原因、目的、进程、各个国家力量对比以及战争发展趋势所作的评论；

（2）政府政策评论。主要指提倡国民响应日伪政府推行的新政策、新活动，评价政府政策的时事评论文章；

（3）社会问题评论。顾名思义，是针对当时华北地区出现的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所抒发的议论；或是指报社针对特定群体或民众提出号召和要求，以适应战时体制的评论；

（4）宣传方针评论。指着眼于阐述报纸的办报方针、当局宣传政策、以及思想统一战的评论。

统计结果，1944年5月到8月间的《华北新报》，社论数量分别如下：

图2：北京《华北新报》1944年5月—8月社论内容统计图

内 容	条 数
战争时局评论	41
政府政策时评	33
社会问题评论	34
宣传方针评论	6
总 计	114

通过对《华北新报》社论内容的具体分析，我们发现以下三个特征：

1、社论着眼于“大东亚战争”的成功，给战争加上了正当化的理由：首先，这场战争是新秩序与旧秩序的对立，不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其次，战争的目的在于帮助中国自强救国，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拯救亚洲，而不是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社论就日本侵略战争的目的和意义反复强调以下的公式：中国的独立救国斗争→→日军对中国救国独立运动的协助→→“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东亚各民族共同繁荣。

例如，社论《由善邻做到中国独立自主》¹¹⁾号召沦陷区民众“以‘对人要求以平等待我，对我要求以平等待人’的‘天下为公’思想，作为善邻理论的基础”。另一篇社论《中国人的立场与中国人的报纸》认为，“大东亚战争”的关键意义在于它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和独立。它的具体内容为：确立使“东亚诸民族”“各得其所”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同英美的“旧秩序”相对的“新秩序”。因此，中国人民应该响应“汪主席”的号召：“欲谋东亚永久之和平，必须各爱其国，互爱其邻，共爱东亚”¹²⁾。这样，通过爱东亚把爱中国、爱中华民族同爱日本，以及接受日本的侵略和统治直接挂起钩来。

2、现代报纸的言论，往往是以民众或媒体的声音为主，针对政府、政党和各部门领导者而发，就时事、政局提出意见。然而，《华北新报》的社论和言论与此相反，战时的社论大多是当局、政府和媒体“对民众发出”的呼吁，批判日本政府、日本战争和日伪政权的绝无仅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报纸已经同日伪政府、军方浑然一体，完全是日伪政府和日本军部的喉舌。

3、由于华北是日本太平洋战争的战略物资基地，为了保证战争物资供应，社论反复宣传强调日伪政权所推出的各种节约增产运动，号召华北民众勒紧裤带，为日本侵略战争提供各种能源和资源。

由此可见，《华北新报》的社论完全服务于日本军政府和日伪政权的统治需要，为其提供舆论支持，并试图影响读者的意见和行为。

（三）副刊分析

现代报纸的副刊主要刊登文化、文艺和生活休闲等方面的文章，文章体裁形式自由、风格多样，是体现报纸个性风格的版面，也是供读者缓解阅读疲劳的部分。

《华北新报》的副刊版面位置比较固定，每日都刊发在《华北新报》的第三版，独立形成副刊版。尽管它与一般报纸的副刊内容相似，也着眼于文化、文艺和教育等领域问题的讨论，但其中很多栏目都具有明显的日伪报纸特征。

其中，“新国民”是根据日本政府所推出的“新民纲要”而特别设置的栏目。“新国民”设立“新国民守则”等子栏目，阐述“新国民”——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国民——应当遵循“爱东亚”、“重道义”、“尚勤俭”、“负责任”、“守纪律”等原则，企图把华北民众培养成“安分守己”，也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惟命是从的亡国奴。

还有许多表面上看来是纯社会性的栏目实际上也立足于号召民众接受日本统治、支持大东亚。比如，“拒毒”栏目宣传大麻的害处，号召民众停止吸食鸦片，其出发点似乎是积极上进的；但正如该栏目所刊登的《救同胞救国家救东亚民族的伟大事业》等文章所显示，它号召民众戒毒仍着眼于“大东亚战争”，认为强健的体魄是保障“大东亚战争”的兵源。

“（现代）教育”栏目也是如此。表面上，栏目关心教育体制内存在的问题，关心教师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实际上，该栏目积极地讨论伪政府奴化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日本的奴化洗脑教育贡献才智。同时，它也号召社会的中坚力量——教师和学生起来支持日本侵华和“大东亚战争”。

新报副刊对待日本和英美文化的态度也是截然对立的。一方面，注重介绍日本文化，如“美术”栏目中的《日本木刻》、《艺术建设与国画复兴》等，企图通过标榜中日“同种同源”、宣扬中日文化的接近性来拉近中国国民的心理和文化距离，为中日亲善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副刊否定英美文化，进一步破坏英美等反轴心国集团的声誉和形象。1945年2月25日《华北新报》的副刊出版了主题为《反轴心国战时生活》的特辑，共四篇文章，抨击反轴心国家国内经济恶性恐慌、生产急剧减少、粮食劳力不足、民众生活惨不忍睹等等。

有时，副刊还直截了当地为当局的政策措施辩护，生活栏目曾经为当局宣传节电问题服务，替当局频繁停电寻找合理借口；副刊还专设栏目为日伪当局所倡导的“防空”运动、拒毒运动、节约运动等摇旗呐喊。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副刊一般局限于文化和文艺等问题，不带有倾向性；但是《华北新报》却不放弃任何一点能替日本帝国主义说话的空间，即便是副刊版也带有明显的舆论导向性，引导沦陷区民众服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总体而言，《华北新报》作为一张战时新闻纸，其内容为了达到战争宣传、控制思想、统一舆论的目的而呈现出如下特点：

- 1，欺骗国民的战况报道连篇累牍，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战况报道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日军总是获得胜利，敌人遭受重大损失；二是美军和重庆政府总是战败，美军的飞机被击落舰艇被击沉的消息不断，对英美国内及其殖民地的报道也明显呈负面，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重重；三是日本的盟国在欧洲战场上也节节胜利，有关德国国内的新闻也一律为正面报道。

- 2，国际报道篇幅增加，且报道内容比较偏重于日本盟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消息，只有极少一部分内容针对日本敌国，且负面信息居多。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国内的报纸关于国共两党的战事消

息较多，国际消息也偏向于国民党的支持者美国国内动态，消息大多来源于美英的国际通讯社；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汉奸报纸大多采用日本同盟社电讯以及日本军部报道部的新闻。

3，社会版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失火盗窃等事件报道大大减少，即便有，也被安排在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以配给动向、节约增产运动、教育物价问题、防空和粮食物资能源供应等为内容的生活治安报道。关于沦陷区民众精神振作、斗志昂扬的报道增多，比如表彰“捐献军用飞机”、“消灭英美国民大会”、“大东亚战争必胜征文活动”等等。

4，社论和副刊带有强烈的舆论导向性。角度不外乎两种：介绍日本的文化风俗，宣扬中日“同文同种”，掩盖日本在中国殖民统治和侵略的本质；抨击英美文化，宣扬英美大不列颠民族是劣等民族等。

5，随着战况和军事报道的增多，报纸广告数量大幅减少。这表明战时新闻纸不可能实现商业运作，经济上也不可能独立。其唯一的可能就是报纸由政府出资，充当政府宣传的喉舌。《华北新报》作为日伪报纸尤为突出，完全是赤裸裸的宣传和控制的工具。

三、《华北新报》所体现的新闻理念

由五家报社合并为一个报社几份报纸，这种机构的整合使《华北新报》的实力不容忽视。作为一个由资深报人运作的成熟报团，《华北新报》在新闻理念方面自成体系，但也隐含不少自相矛盾之处。以下将从读者定位、价值观选择、和效果预期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

（一）读者定位：青年和知识分子

《华北新报》将它的目标读者群定义为青年和知识分子，这在它的系列征文活动以及社论的内容里都体现出来。从1944年5月创刊开始，《华北新报》利用暑假即将开始的时机，大张旗鼓地讨论大学生毕业的出路问题。报纸还在六月下旬开展了“学生出路问题”的征文活动，并开辟专栏刊登了十篇征文，希望以此来引起青年学生的注意和讨论。紧接着，8月，《华北新报》又借各大学开学之机，开展了“我入某某系以来；大学教育对我的影响；假如我再入大学；大学第一年的读书方法”和“现代教育”的征文活动。到寒假临近时，报纸又开始寒假征文的活动，还特地开办了“（现代）教育”的栏目，对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以吸引教师的注意力。

同时，《华北新报》的社论也大力开展针对教师、学生、知识分子和教育体制的讨论。从1944年5月到1944年8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华北新报》刊发了《救救教师》、《教育行政会议的几点建议》、《敬告本届大学毕业生》等十篇直接针对教师和学生的社论。社论中，《华北新报》为拉拢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心，一方面装出同情学生、关心教师的样子，在社论里为解决教育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大声疾呼；另一方面，又以学生、知识分子贴心人的身份，号召知识分子支持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参与“救国”。希望能够通过知识分子带动沦陷区的所有民众支持和参与日本侵略战争，全民上下“一心决战”。

《华北新报》之所以选取青年和知识分子作为新报的目标受众，原因至少有四。首先，日伪当局认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社会舆论的领袖，也就是现代传播学所谓的“意见领袖”。只要能够占领社会中坚力量的有识人士的思想，通过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百姓的思想就不攻而破了。其次，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水平仍然非常低下，文盲率比较高，大多数农民和普通老百姓都不识字，无法阅读报纸；加上战争时期物价高涨、通货膨胀率高，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根本无力订阅报纸。再者，青年人

的思想相对活跃，较易受外界舆论环境的影响，是新闻教育的理想对象。《华北新报》所负有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对沦陷区的人民进行所谓的“政治教育”。最后，改造青年人的思想，无疑可以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充当日本侵略军的炮灰或“建设兵团”。

（二）矛盾的新闻价值观：服务大众还是政宣的喉舌？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报人，管翼贤非常了解一份报纸要生存就必须符合读者的口味。新闻本身即具有大众化、商业化的性质。在其《新闻学集成》中，管翼贤强调，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公众感兴趣的事实。公众的兴趣大小又是依据事实距离人的远近而定的。他说：“新闻挑选之第一个原则是公共兴趣的程度。在选定以为刊登的新闻中，大部分不可缺少的性格是兴趣，因为兴趣，惟有兴趣本身，才能使报纸有引诱力，才可以卖出。一个报纸若毫无兴味，就卖不出去，而且报纸上所刊登的新闻，公共兴趣越大，则其报纸的销数愈广¹³⁾。

新闻本位论还要求言论自由和公正。《华北新报》在社论中公开声称《华北新报》的言论“不偏不倚，守正不阿”；“华北新报是全华北人的报纸，也可以说是全中国人的报纸，和自由主义时代，某一个报属于某一个人，或者属于某一个机关等等，迥乎不同。”¹⁴⁾《华北新报》还表示，“新闻社是表达民意的机关，是领导正当舆论的所在”¹⁵⁾；人民的报纸“是为了服务社会人群而办报，我们要做的事是要与人有益的，说话是要与老百姓发生关系的”¹⁶⁾；“我们的出发点，是民族立场，民众立场与人格立场。我们的归趋点是建设性的，必须有事实，有批判，有主张，有创造”¹⁷⁾；“报纸是社会公器，所以它本身不能够标奇立异，每一件消息，每一篇言论，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各阶层。”¹⁸⁾

其实，之所以《华北新报》如此大篇幅地宣传报纸本身超然独立的立场和言论的公正性，本质上也是为了能够披上言论自由和公正新闻的外衣，而达到其欺骗宣传的目的。正如日本大使馆报道班长重富义男在《华北新报》创刊一周年纪念文章《张笔阵争取解放》中所说：报纸应该首先“成为民意代表者”，才能完成“解放东亚之思想战”的任务¹⁹⁾。实际上，处于日本军政府和日伪政府操纵之下，完全由日伪政府提供资金的《华北新报》怎么可能遵循西方资本主义所谓“自由公正”的新闻本位价值观呢？只有法西斯主义的新闻原理才能为其提供行动的指南。管翼贤认为新闻自由是“立足于新闻使命上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完成报纸所被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是讨论报纸新闻言论自由的前提。这与希特勒的政治宣传理念非常相似。希特勒认为政治和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把宣传视为政府、政党和权力集团等为实现政治目标、说服煽动群众的最行之有效的工具²⁰⁾。《华北新报》奉行的就是“政宣合一”的理念。

首先，报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由政府要人直接兼任，实现组织上的政宣统一。社长管翼贤本人就兼任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总务厅情报局局长（后兼任华北报道协会理事长）。

其次，《华北新报》的社论多次强调政治和宣传之间的关系，认为宣传和政治的结合是必然趋势，也是达到最佳宣传效果的途径：“政府与报道之更密切的结合亦为必然者，盖政府施策，必在新报纸的支援下才能收到更宏伟的效果，而政府亦必能采纳舆论的要求，是能达成真正的‘众人政治’目标也”²¹⁾。《华北新报》1944年8月25日头版《心力必可战胜物力、宣传应与政治合一——竹田部长在宣传会议讲演》一文中（竹田系日本军部报道部部长）也强调了宣传和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各方均以压迫之态势，向德进攻。思想战之特性，诸君均知，即对战胜国用思想战，其收效迟，而对战败国施以思想战，则其收效速……宣传即政治，宣传指导政治”。《华北新报》还明确表态，“在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莫过于报纸，报纸负有‘协力政治’和‘为民喉舌’的两种任务。”²²⁾

由此可见,《华北新报》的新闻价值观存在着表面和实质的严重分裂。表面上,报纸标榜服务于大众、商业化和以新闻为本位;而实质上,却奉行“政宣合一”,沦为法西斯主义宣传的工具。《华北新报》以及日伪新闻业所极力标榜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必须以服务于日本侵略、统治和思想统一为前提;新闻自由也必须体现日本侵华和“大东亚战争”的思想和利益。因此,《华北新报》所代表的日伪新闻体制其本质为:“要之新闻新体制除形式外,尤其内容,其最大之目的乃为使华北之生活改变,从前固然都主张言论自由,办报者尤须言论自由,现在为完成此伟大之战争,新闻必须随之步入同一方向”²³⁾。在政宣合一,宣传完全为政府当局的政治目标服务时,报纸也就成为了彻头彻尾的维护伪统治、宣传伪思想的工具。

（三）效果预期：报纸能“创造历史”？

管翼贤认为,人的社会知识是由新闻所图示化了的社会形象。他说,尽管“新闻是虚伪的储藏,是浸入人们知识中的一种谬误”,但是人们仍然相信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是真实的,把“新闻化的世界”当成“真实的事件”,新闻具有“由无生有”的神秘力²⁴⁾。《华北新报》在其发刊词中提出,“报纸是传布最普遍收效最广泛的宣传手段”,“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手段,拿出报道报国的精神,展开热烈坚强的思想宣传战,希望以‘精神的武器’,锻炼国民的战斗意志,努力创造今后的历史。”²⁵⁾也就是说,报纸不仅是“最普遍最有效最广泛的宣传手段”,甚至还能够“创造历史”。

日本侵华期间,在这种“新闻报纸神化”思想的指导下,日本侵略者把报纸当作能够统一所有国民思想的最有力的统治工具,以便“由国家新闻发挥其威力,以我之思想,转移敌人之思想,以我之精神,征服敌人之精神,使敌人由心理上崩溃,进而为国家之崩溃”²⁶⁾。报纸俨然成为消灭敌人、颠覆政权的超级武器。由于盲目迷信新闻和报纸的力量,《华北新报》曾反复强调“新闻纸为促进国民总力的集结,顺应国家政策的方向去进行而负有重要的义务固不待言”²⁷⁾;“战时的新闻,是为了战胜而出版”²⁸⁾;“在‘战争第一、国家至上’指标之下,所谓报纸之立场应与夫舆论之方针,借以适应现阶段之需要,而培养各阶层之中心意识,正确思想,使国家解放,东亚共荣之伟大鹄的,可以完成与实现”²⁹⁾。

“东亚共荣圈”的梦想破灭了,《华北新报》的“神话”也只能令汉奸报人们失望。日本投降后,《华北新报》苟延残喘了一月有余,最终于1945年9月底在蒋介石政府的大力清算之下草草了事,结束了它滑稽落魄的生命。《华北新报》的停刊是日本帝国主义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彻底失败的必然结果。任何一个报纸,不管其传播技巧多么高明,一旦站到了反人民、反历史、反潮流的立场上,就必然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华北新报》的短暂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本文对《华北新报》的形式、内容、及其新闻理念做了初步的分析。受资料等限制,这一研究尚有缺陷。例如,《华北新报》的发行量到底有多大,其效果如何,似乎还缺少准确的数据。

作为一张新闻纸,《华北新报》的新闻理念和经营是系统而成熟的;导致失败的是其日伪报纸的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北新报》只是战时日伪统治和日本侵略战争的宣传机器,完全不同于和平自由社会当中的新闻纸。以《华北新报》为代表的日伪报纸不过是战争与新闻结合的畸形儿。日伪报纸一手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另一手则完全背离新闻真实的原则,肆无忌惮地捏造事实,行统一沦陷区民众思想和舆论之实,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和统治。笔者借此冷观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对新闻的控制,不得不认真反思:战争给新闻事业带来的究竟是怎样的“痛”?

注

- 1) 对此,《〈华北新报〉研究》的上篇有详细介绍。
- 2) 管翼贤:《本报创刊一周年》,天津华北新报1945年5月1日一版。
- 3) 《统一华北思想战——同盟通讯社古野社长队本报祝辞》,北京《华北新报》1944年5月5日第二版。
- 4) 《肩负起时代任务 确立新闻体制》,天津《华北新报》头版1944年9月26日。
- 5) 管翼贤编辑:《新闻学集成·编辑篇》第133页,(伪)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版。
- 6) 见北京《华北新报》1944年6月30日的征订启事。
- 7) 立重:《日寇侵华宣传工具》,《新闻史料》第一辑,第42页。
- 8) 《天津华北新报社昨招待各界茶会——管社长说明本报使命》,北京《华北新报》5月5日第一版。
- 9) 宁新:《日本报业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
- 10) 前引管翼贤编纂:《新闻学集成·社论篇》,155-159页。
- 11) 《由善邻做到中国独立自主》,北京《华北新报》1944年7月7日头版社论。
- 12) 《中国人的立场与中国人的报纸》,天津《华北新报》1944年5月10日。
- 13) 同上。
- 14) 《华北新报是全华北人的报纸》,保定《华北新报》1945年2月10日。
- 15) 前引《肩负起时代任务 确立新闻新体制》。
- 16) 《发刊词 我们的正确态度》,天津《华北新报》1944年5月1日。
- 17) 《言论自由与言论统制》,北京《华北新报》头版社论1945年4月18日。
- 18) 前引《华北新报是全华北人的报纸》。
- 19) 重富义男:《张笔阵争取解放——纪念华北新报创刊一周年》,《天津华北新报》1945年5月1日。
- 20) 祝基滢:《政治传播学》第31页,三民书局印行1990年版。
- 21) 《政治与舆论》,《太原华北新报》1945年1月16日头版社论。
- 22) 《政治与舆论》,山西《华北新报》,1945年1月16日。
- 23) 《创造新闻新体制——华北新报近日创刊》,天津《华北新报》1944年5月1日。
- 24) 前引,单波《论管翼贤的新闻观》。
- 25) 前引《发刊词 我们的正确态度》。
- 26) 前引管翼贤编辑:《新闻学集成·总论篇》第16-17页。
- 27) 前引《创造新闻新体制——华北新报近日创刊》。
- 28) 同上。
- 29) 前引《中国人的立场与中国人的报纸》。